

Barbara W. Tuchman



# 实践历史

*Practicing History*

[美] 巴巴拉·W. 塔奇曼 / 著

孟庆亮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Barbara W. Tuchman



# 实践历史

*Practicing History*

---

[美] 巴巴拉·W. 塔奇曼 / 著

孟庆亮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历史 / (美)塔奇曼著;孟庆亮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0225-237-0

I.实... II.①塔... ②孟... III.美国—历史—文集

IV.K71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5728 号

---

## 实践历史

(美)巴巴拉·W.塔奇曼 / 著 孟庆亮 / 译

责任编辑:刘刚

装帧设计:林涛 秦嶷

---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

经销电话:010-65512133

邮购电话: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1300 1/32

印张:10.875 字数:278千

版次:2007年4月第一版 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书号:ISBN 978-7-80225-237-0

定价:39.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前 言

一个人在回顾其过去作品的时候，总是会诧异地发现，哪些似乎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又有哪些早已凋零枯萎。我所能发现的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唯一原则（而且是拥有众多例外的原则）便是：总体上，当前具有“硬”主题也就是真实性主题或者个人亲身经历的文章或报告比那些打算作为讽刺或鼓吹，或者出于一时的政治热情而写就的“思考性”作品更具有可读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听起来似乎令人尴尬的是，除了一两个特例之外，这些并没有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我力求阐明的将什么包括在内或者把什么排除在外的每一个原则中，总有些例外情况。我本来应该考虑到的由目击者对历史事件所做的两个陈述在本选集中读起来会很舒服，但在重新阅读的时候却没能发现值得再次引起人们关注的特性。一个是为《圣路易斯邮报电讯》所写的对肯尼迪总统葬礼的描述，另一个是为《华盛顿邮报》所写的1967年6月“六日战争”之后对耶路撒冷重聚的描述。在第一个例子中，或许是由于我在《八月炮火》中描述爱德华七世葬礼的开头几个段落，他们让我去报道肯尼迪仪式，我接受这个任务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非责任。于是我佩戴记者证，瞻仰了国会大厦圆形建筑中的总统，第二天一早就跟随人群在拉斐特广场上走动，看到了来访国家元首非常随便的行进队伍，其

中戴高乐鹤立鸡群，我还参加了在阿林顿国家公墓举行的仪式，然后回到旅馆房间里为第二天早晨的报纸撰写评论直至午夜。然而，所有这个国家的人们在过去三十六个小时都在通过电视观看整个活动过程的每一个时刻，我还能写什么呢？我不能简单地描述大家都看到的東西；我必须提供某些特别的意义。这对我而言实在过于仓促：我尚不了解卡米洛特的神秘感；在那一时刻我感受不到肯尼迪在历史上的地位或重要性，而且午夜的最后交稿时刻也令我身心疲惫。我因此在评论中使用了非常冷漠的观点，那些期望恢宏盛大语气的读者都失望至极。

在耶路撒冷，克莱克市长力排众议，命令清除带刺的铁丝网和无人区的障碍设施。此时我就在现场并陪同一个以色列家庭拜访已经十九年没见过面的阿拉伯朋友，我看到在街道上摆摊的阿拉伯小贩昏昏欲睡地打着呵欠，早已占据街道角落以便卖些软饮料和铅笔，而他们的山羊则小心翼翼地溜进了新城。这是紧张不安、充满戏剧性事件和重大意义的一天，然而就像对肯尼迪葬礼所做的报道那样，我的评论缺乏强烈的冲击力。我在此引用这两个例子并非让读者做出判断，而是阐明确立选择原则的难点之所在：我共享了一个事件中那一刻的情感，而对两个事件的描述同样平淡无奇。

说来也怪，之前一年在我初次访问以色列而为《星期六晚邮报》所做的关于以色列的报道（第30页）现在读来仍然感觉不错。或许是由于初来乍到的新鲜感，或许是由于读者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从而没有情感纽带。我想在一篇文章中传达所有的感受、事实以及这个新国家的历史渊源和意义。人们在某个既定的尝试中并非总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但这一次我认为是成功的。后来的几年时间里，佛多尔一直用这篇文章作为他们所编的《以色列指南》的导论。

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就像第二部分开头关于日本的小篇幅文章那样，都需要对引起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加以解释。我1933年

大学毕业,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上美国总统,而阿道夫·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毕业之后我作为志愿者(在1933年有报酬的工作寥若晨星)到太平洋关系学院的美国理事会工作。这是太平洋沿岸成员国家的国际组织,包括英国、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以及中国和日本。当时的理事们认为,太平洋关系学院的日本理事会代表日本处境艰难的自由主义者,需要得到学院所能给予他们的鼓励和威望,为此理事会议决定将东京作为太平洋关系学院当时主要项目《太平洋经济指南》编撰的总部所在地。与此相应,太平洋关系学院的国际秘书威廉·L. 霍兰德被指派到东京的日本理事会指导《指南》的编撰工作,并在1934年10月我作为他的助理一同前往。我在东京呆了一年,然后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于1935年末经由跨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过莫斯科和巴黎回到美国。

在日本期间,我为太平洋关系学院的刊物《远东纵览》及《太平洋事务》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通常都是关于像俄日渔业争论这样并非公众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不过,在就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所写的关于日本的一本书进行评论时,我非常惊讶地从作者那里收到一封称呼“亲爱的同事”的信。我感到自己被纳入了国际专业人员领域。这封信,连同我为《太平洋事务》写的第一篇文章而收到的四十美元稿费(我用这笔稿费买了一架留声机及《蝴蝶夫人》的唱片)使我感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开始。

回到美国,我试着表达对日本的了解和思考,就是本书中关于日本的这篇小文章。我不记得这篇文章是何时或如何提交给《外交事务》这样令人敬畏的期刊,但突然间,我的文章就在上面发表了,二十四岁初出茅庐的我与外交部长及决定社会舆论的人的名字一同出现在刊物上。更为重要的是,我由此认识了博学杰出的人物,就是刊物的编辑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壮。

同时,也就是1936年,我到《国家》杂志工作。该杂志是我父亲——一位非常具有折衷兴趣的银行家为了避免它破产而从奥斯

瓦德·加里森·维拉德手中买下来的。接替维拉德作主编的是我父母的朋友弗雷达·科尔茂魏,此外还有一位新的同事马科斯·勒纳。我的工作最初是从各式各样的报纸和期刊上剪辑新闻进行归档,并逐渐撰写一些关于当前时事的二百字左右的文章以刊登在每周《国家》的首页。就所布置的某些一无所知的题材进行写作,比如累犯、移民劳工、乔治·奇切尔因之死、TVA、AAA、奈氏军火委员会、芒特海峡会议、纳粹党代会等等,就必须搜集所有相关事实,然后用《国家》观点压缩到两百字左右的篇幅,并按时准备好。尽管文章都很短,但这样的经历对我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在《国家》的委派下,我于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到了巴伦西亚和马德里,随后继续呆在欧洲,赶上反对不干涉和绥靖政策以及被另一方称为“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活动的高潮。这是一个昏暗的时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信任和背叛的时代,一个拥有英雄、希望和幻想的时代。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达到成年的那十年而不是出生的那一年才是其应该持有的标记。我认为自己出生于1930年代。我认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具有跟我一样的信念。我相信正义与理性最终会胜利。在伦敦,我编了一本题为《迷失的英国政策》的小册子,意在表明英国如何将使西班牙(以及通向地中海的门户)摆脱欧洲大陆霸权国家(当前是希特勒)的控制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这是一本质量不错的研究作品,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很有倾向性。”我还为每周一期的被称为《西班牙战争》的刊物的信息专栏撰写稿件,这本杂志得到西班牙政府的资助,但是我对自已撰写的文章并没有存档。

在慕尼黑会谈期间我回到美国继续从事西班牙方面的工作,并与美国记者中对西班牙事务最为熟知的杰伊·艾伦共同编写关于战争起源的编年史。随着共和国在1939年的失败,我的心也几乎破碎,从政治角度来说,我丢弃了幻想,不得不承认现实政治;这是我成年时期的开始。我为《新共和国》写了一首西方国家在西班牙战争结果中所起作用的挽歌,称为“我们看到了民主的失败”,但

作为三十多年后让我惹上麻烦的文章之一，这首挽歌没有包括在本书之中。

1940年6月18日，希特勒进入巴黎的那一天，我与纽约的医生莱斯特·R.塔奇曼博士结婚。他并非毫无道理地认为，在这个前途渺茫的时代，不适宜要孩子。而一度明智的我则认为，如果要等到局势好转，我们或许要永远地等下去；要想要孩子，我们现在就该要，与希特勒的行动没有关系。男人的专权并非完全像今天的女权主义者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九个月之后，我们的第一个女儿降生了。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丈夫加入医疗队，我带着孩子跟他来到位于阿拉巴马州的拉克营地；而当他于1943年早期跟随医院到国外的時候，我们回到了家乡，我到了位于纽约的战争情报办公室（OWI）工作。

位于洛杉矶的战争情报办公室主要向远东播送美国新闻，而我们则从纽约向欧洲播报新闻。因为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我被分配到远东席位，专门向我们的欧洲听众解释太平洋战争以及美国在亚洲所做的努力。在履行任务的过程中我间接报道了史迪威将军在缅甸的作战活动，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这一事件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直到我写了一本书，其中史迪威成为美国在中国期间的焦点人物。

除此之外，我不记得在战争情报办公室写过其他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只有两个对期望出现的事件进行预料的“背景情况介绍”，一个是为美国登陆中国做准备而关于中国历史及其海岸线的地理情况，另外一个是关于苏联远东的介绍，是假设苏联加入反对日本的战争的情况而准备的。席位的编辑受过专门的新闻记者职业培训，对我写的这些东西越来越不耐烦。“不要查找这么多的材料”，他说，“如果你不了解那么多信息的话就会很快完成工作。”尽管这对一个赶在截稿时间之前完成工作的新闻工作者来说绝对正确，但却不适合我的性情。无论如何，在那一刻战争突然结束了，我也不知道我的“背景情况介绍”命运如何。我希望重读一下，但



我在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作期间可能保留的所有资料似乎都无影无踪了。

在这本书中没有 1940 年代到 1959 年期间的文章，因为战后我丈夫从国外回来，我们又有了两个孩子，家务活动一度占据了我的生活。此外，我也开始一直以来所想的写本书的工作。1948 年我着手写作第一本书《圣经与剑》，断断续续共花了六七年时间，而且又用了更长时间寻找出版商。接着是《齐默曼电报》，然后是“波蒂卡瑞斯”，后者篇幅太小不够一本书，因而剪辑成为本书中短篇故事的长度。

从 1960 年代起，我的作品选就或多或少具有了自己的风格。作为我唯一一次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平民与军队”代表某种对常规的偏离。当然，还有一次没有包括在内的是 1967 年女儿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时我做的演讲。通常来说，我坚决反对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因为我不知道该对年轻人讲什么，而且我也不希望只是用非常笼统的说法应付那样的场合。然而，1972 年，在应邀到威廉斯学院演讲时，我感到自己确实有某些具体的东西要说，那就是在我看来年轻人为反对后备军官训练队以及兵役而举行的盲目愚蠢的抗议行动。我认为在越南发生的战争是罪恶的、毫无根据和理由，而且是失败的，但作为平民而言，将卑鄙肮脏的工作留给军队而自己却刻意保持清高在我看来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也不是让下一代掌控军队政策的最好方式。如果他们想控制军队的组织机构，我认为，他们就应该加入后备军官训练队，然后采取行动。一家报业辛迪加把我的演讲散布出去并大肆重印，而且，我后来得知，还导致一位怒发冲冠的威廉斯学院男校友向联邦调查局提交了一份对我的投诉。

继 1971 年《史迪威》出版之后，我写了一系列美国对中国关系以及对越南影响的文章，但当主题在书中尽皆表达的时候，似乎已没有必要重新赋予只具瞬间吸引力的作品以生命力。但关于毛的文章是一个例外。作为对该事件的首次披露和报道，这是我颇感

自豪的原创性历史研究。《外交事务》大张旗鼓地刊登了这篇文章，一方面是作为刊物发行五十周年的特稿，另一方面是私下里奖掖我自第一次诚惶诚恐为刊物撰稿以来迄今已三十六载的经历。

有两篇文章我感到非常遗憾没有出现在本选集中。一篇是“这本书”，是1979年在国会图书馆所做的西尔克斯演讲；另一篇是同一年所写的题为“质询政府坚持不明智行为”的文章。前者似乎不够资格作为历史资料入选本书；后者作为将来一本书的核心篇章现在被束之高阁，在不久的将来定会破茧而出。

本书中所选的文章与最初出版或演讲时基本没什么改动，只有一两个对事实的修正（直到本次出版才注意到的一个错误是，与天使扭斗的是雅各布，而非最初版本中的约瑟夫）、对于重复短语的几处删节、对几句听起来别扭的语言的更改（当然思想没有改变）以及对一些原有标题的改动（编辑们用他们的选择替换了我的标题，当然之后却总是后悔）。这次出版都恢复了我最初所用的标题。

由于我对哲学有一种恐惧，所以我不想回答这里所选的文章放在一起是否会呈现出某种历史哲学的问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包含一种为了自己的体系而试图操纵手头事实的风险，其结果便是历史中的意识形态远比“历史真相”更具有影响力。然而，我认为长期的历史写作必定会形成某些原则和方针。我想，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体察到对历史的感悟，即人类行为就像穿过具有不同环境的一望无际的田野的潺潺溪流那样，总是充满许多偶然性，或许还会轮转和循环，好与坏共存并难以分割地混合在一起，湍流与逆流的同时出现时常对轻易做出的论断进行驳斥。至于处理的方法，我认为在形成自己的论点之前一定要先对材料加以论述，按年代顺序进行的叙述是使历史更接近“真相”并对原因和结果做出恰切理解的脊椎和血液；无论什么样的题材，都必须从当时人们的了解和认知而不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写作，否则结果就毫无根据因而是错误的。尽管我不认为具有独创性，但这就是我在行业的学习以及职业生涯的演练中自己所发现的原则。

#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部分 写作手法 .....	1
寻找历史 .....	3
历史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	16
以盎司来衡量的历史 .....	25
作为艺术家的历史学家 .....	39
历史学家的机遇 .....	46
在写作史迪威将军的传记中遇到的问题 .....	63
研究场所 .....	75
传记是历史的三棱镜 .....	79
第二部分 历史的教训 .....	93
日本:一个诊断符 .....	95
竞选列车 .....	100
马德里在读什么书 .....	103
“让波蒂卡瑞斯活着,不然就干掉莱苏里” .....	107
最终解决方案 .....	124

以色列：太多不可能性的土地 .....	130
弗洛伊德眼中的伍德罗·威尔逊 .....	157
我们是如何进入一战的 .....	171
以色列的利剑 .....	187
如果毛泽东来到美国 .....	202
同化主义者的两难抉择：摩根索大使的故事 .....	223
基辛格自画像 .....	234
人类更美好的时刻 .....	244
第三部分 从历史中学习 .....	265
历史指引未来吗？ .....	267
关于越南 .....	278
什么时间、为什么及如何摆脱战争？ .....	278
在越南成立联合政府——够不上再一个生命的价值 .....	282
文官与军队 .....	284
当前不满的历史线索 .....	290
为将之道 .....	300
为何政策制定者不听从意见 .....	314
水门事件与总统职位 .....	323
我们应该废除总统职位吗？ .....	323
对于矫正的畏惧 .....	326
给众议院的一封信 .....	328
消除总统职位的隐患 .....	330
关于国庆日——美国的建国思想 .....	333
译后记 .....	336

# 第一 部分

## 写作手法



## 寻找历史\*

在我大约六岁的时候,通过露西·菲奇·帕金斯的《双胞胎》系列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开始关注荷兰双胞胎的命运;毅然大胆地将倒着拼写就是“自由”的单词涂在他们船上的美国革命的双胞胎;尤其是在1914年德国占领布鲁塞尔期间饱受痛苦折磨的比利时双胞胎。

在《双胞胎》系列之后,我又经过G. A. 亨帝时期,并深切感受到在加拿大的沃尔夫将军的痛苦。然后就是长时间的大仲马时期,期间我熟知了瓦卢瓦国王、王后、皇室情妇以及形形色色的公爵,以至于当我们参观法国城堡的时候我能够向家人指出是谁在哪个房间刺杀了谁。柯南道尔的《忠实的伙伴》以及简·波特的《苏格兰酋长》对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我穿着苏格兰格子呢衣服,戴着天鹅绒制的宽顶无檐圆帽,以高贵的华莱士形象参加了我的第一次化妆舞会,在沉默的悲剧氛围中大步流星昂首穿行在装扮成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朱丽叶的十二岁孩子中间。在这本书中背叛了华莱士的马尔伯爵夫人的叛逆行为所带的一个脚注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位邪恶的妇女所犯的罪行”,它带着威胁的语气说,“将会得到历史的检验”。

---

\* 1963年4月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斐贝塔卡帕演讲。  
刊载于1963年5月的《拉德克利夫季刊》(Radcliffe Quarterly)。

当我考上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时候,我毫不费力地选择了专业领域,尽管后来成为历史文学而不是纯历史研究。在大学阶段我没有经历过让我决定写作历史性记叙文体的重要事件。我实在说不出做出这一决定的准确时间;我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写起来,而且延续了这么久。然而,拉德克利夫学院所给予我的是一种动力(更不用说教育了,但我认为那是不言而喻的)。部分动力来源于主干课程和了不起的教授。在我受益最深的三位教授中,奇怪的是有两位是文学而非历史教授。他们是欧文·巴比特的《文选Ⅱ》和约翰·利文斯通·罗兹的《英语72》,后者包括作者对《老水手》和《忽必烈》写作缘由的引人入胜的介绍。他向华兹华斯挥手,简短地向济慈和雪莱鞠躬致敬,用了十二周的讲座探寻科勒律治意象的来源,花了至少一周时间研究从波洛克来的那个人的突然出现所带来的重大影响。至少对我而言,使我们津津有味自始至终听下去的是罗兹对自己所研究对象的那份激情和执着。

这种品质也是讲授《英国宪法史》的C. H. 迈克尔凡恩教授的基本素养。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和历史学家,迈克尔凡恩并不介意只有我们四个人选他的课程,或者他早就在哈佛上过这门课,现在不得不向我们重复一遍(这是当时非常奇怪的做法)。根据我的记忆,之所以不介意是因为迈克尔凡恩教授正与盎格鲁人的法律和《宪章》条款,尤其是第三十九条处于热烈的恋爱时期。像任何沐浴在爱情中的人一样,他想让任何人都知道他深爱的对象是多么美丽。他满头银发,红润的面颊,我所见过的少有的明亮的蓝眼睛。尽管第三十九条的内容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但我确实记得当他讨论的时候蓝色眼睛是怎样闪闪发亮;而我是如何坐在座位上聚精会神地听讲;为了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我本来打算孤注一掷写一篇出色的考试论文,结果却发现考试题目中有一半都是有关盎格鲁-撒克逊方面的知识,而这一部分他忘了预先警告我们。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最后给我们四个人都打了A分,或许是感谢我们再次花时间听他的课,使他有机会谈论他心爱的



《宪章》。

作为古典主义者和反罗曼蒂克式的人物，巴比特教授不赞成对研究对象的热情。但他却总是那么积极热切、精神饱满地以博学之思表达对热情的蔑视，最终也热情奔放，不仅令我，而且让所有听众都进入全神贯注、浑然忘我的状态。

尽管我并不了解或者在当时没能有意识地做出明确的表达，但深爱自己研究对象对于写好历史或写好任何内容的作品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品质。几个月前当我在另外一所大学演讲期间，他们邀请我在晚宴上会见了教职员和其他客人。席间一位历史系的年轻教师说他非常羡慕我在《八月炮火》中的主题，并且坦白地说他的博士论文写作陷入困境，现在不得不中途停下来。他告诉我说，他的论文论述的是一位在从未接受过“洗礼”的国家刚果的早期传教士。我问他困难在哪里，他情绪低落地点了摇头手中的鸡尾酒说，“我就是不喜欢他”。我感到有些悲伤和沮丧，既为他，也为时下的学术环境。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正在或者将要毕业，但当你们要写一篇论文，比如说，关于“在洛普·戴维加后期诗剧中源自勒潘托战役的水下景象描述”，我希望你选择这样的主题是因为你对它充满激情，而不是因为你所在的系认为这是原创性题材而建议你去做研究。

在我自己做论文的过程中（不是博士论文，因为我从未获得过学历；只是我的本科荣誉论文），发生了我的职业生涯中对我影响最深刻的经历。这并不是导师或教师或同学或一本伟大的书籍或某个知名访问学者，比如才能卓越的查尔斯·韦伯斯特伯爵，而是在魏德纳的大量藏书。它们是我的阿基米得澡盆、燃烧的矮树丛、我发现个人抗生素的模盘。我被允许拥有自己的一间小卧室，卧室的窗子下有张桌子。后来得知，卧室有个奇怪的名字，叫小单间阅览室，我坐在里面的时候从来不知道有这个叫法。我的房间位于 942S 阅览室（也就是英国历史阅览室），我可以在浩繁的书架间随意走动，想看什么书就拿什么书。这样的经历真是不可思议，简